

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(二〇)

李致忠

《龙龕手鑑》四卷 辽释行均撰 宋刻本（卷三配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）每半叶十行，行大小字不等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行均行实不详，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，行均是辽代僧人，字广济，北地于氏子。博学多闻，淹贯群书。能诗文，尤精文字音韵，士夫多就学之。有《龙龕手鑑》行世。也有记载说他是幽州僧人，实则就是活动于今河北、山东、北京一带的比丘。此地时为辽国所辖管，故称为辽释行均。

契丹人信佛甚笃。“北朝皇帝好佛法，能自讲其书。每夏季，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，执经亲讲。所在修盖寺院，度僧甚众。因此僧徒纵恣，放债营利，侵夺小民，民甚苦之。然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，杀心稍悛。此盖北界之蠹，而中朝之利也。”

（苏辙《栾城集·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》卷四十一）这是北宋时苏辙奉命出使辽国回朝后的一段描述。足见契丹人由于皇帝好佛，故所在修盖寺院，度僧甚众。契丹人亦缘此诵经念佛，杀心稍悛。为适应这种佛事需要，便于善男信女诵经及高僧研读佛经，行均才起而编纂《龙龕手鑑》。

自六朝迄唐五代，汉字中的俗字极为盛行，今所见敦煌所出写经中，这种俗写字就很多。这些俗写字、异体字、偏旁无定，

繁简无定，字形无定。识字、读音、检索、解义，均极困难。行均以僧人自身的体认，动手编纂《龙龕手鑑》。《龙龕手鑑》辑录了写本经卷中大量的俗体字和异体字，并依照写本经卷中所收俗字、异体的偏旁归部。而在每字下，均详列正体、俗体、古体、今字以及或体，并作简单的音义注释。部首则按平上去入四声为序排列，各部所收之字亦按平上去入四声顺序排列。这一著作的问世，对当时北地人诵念、研读佛经，无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时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字法炬者，尝于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十五年（997），即北宋太宗至道三年，为行均《龙龕手鑑》所写的序文谓当时佛经“流传岁久，抄写时讹，寡闻则莫晓是非，博古则徒怀惋叹，不逢敏达，孰为编修！有行均上人，字广济，俗姓于氏。派演青齐，云飞燕晋，善于音韵，嫻于字书。睹香严之不精，寓金河而载缉。九仞功绩，五变炎凉，具辨宫商，细分喉齿，计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，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余字，并注总有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余字。无劳避席，坐奉师资，诘假担簦，立法疑滞。……新音遍于龙龕，犹手持于鸾镜，形容斯鉴，妍丑是分，故目之曰《龙龕手镜》。总四卷。以平上去入为次，随部复用四声列之。”亦表述了行均编纂《龙龕手鑑》的缘起和初衷以及该书的体例和价值。此书由于旨在辨字体之正俗，释诸字之常义，故对当时流传之写经中的各种异体写法之字，依不同偏旁部首都收进来。如写经中之瓢、瓠、虬，亦写作瓢、瓠、虬，《龙龕手鑑》就将这些字既收入瓜部，又收入爪部。于是该书中就出现了“瓜”、“爪”不分，“瓦”、“凡”不分，“鬥”、“門”不分，“雨”、“两”不分等现象，被晚清李慈铭指斥为“部居误偏旁”，“俗谬怪妄”，“直是费书，不可用也”。（见李慈铭跋语）其实这种批评是不了解《龙龕手鑑》编纂的目的和作用。对这些现象，行均是很清楚的，有时在注释中亦加以说明。如于“瓜”部“瓜”字下便注云：“古花反。又瓜部写爪部相

滥，爪音侧绞反。”可见李慈铭的批评是言不中的的。且行均虽遵奉本教，编纂《龙龕手鑑》亦每引佛经如《中阿含经》、《贤愚经》诸字，以补六书之所未备。然不专以释典为主，而是于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之外亦多所搜辑。所以传至今日，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前后人们使用俗字的状况，还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汉字流变的某些信息。同时对阅读大量的敦煌写经，推动敦煌学发展，仍有一定的价值。

宋辽同时并存，且关系时好时坏。而每当关系趋于紧张，宋辽都彼此封锁消息，书禁也甚严。然北宋书禁虽屡有规定，但终无死罪。辽则不同，“契丹书禁甚严，传入中国者法皆死”。

（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十五）因而有辽一代之遗编，诸家著录亦颇罕。“熙宁中有人自虏中得之，入傅钦之家。蒲传正帅浙西，取以饷板。”（见《梦溪笔谈》卷十五）这是所知宋辽交战过程中传入中原的第一部书，这部书就是《龙龕手鑑》。

《龙龕手鑑》原名《龙龕手鏡》，由辽传入北宋后再行刊印时，为回避北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名讳，于是改“镜”为“鑑”。而宋代第一次主刻此书者，据沈括《梦溪笔谈》所说即是蒲传正。考蒲传正，当即蒲宗孟，传正是其字，阆州新井（今四川南部县）人。北宋皇祐进士，调夔州观察推官。熙宁元年（1068）改著作佐郎。召试学士院，以为馆阁校勘检正中书户房兼修条例，进集贤校理。同修起居注，直舍人院，知制诰，同修两朝国史，为翰林学士兼侍读，拜尚书左丞。帝尝以无人才为叹，蒲传正则率尔对曰，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。帝不悦，罢知亳、杭、郢三州。沈括所谓“蒲传正帅浙西”，盖即指其知杭州时。考蒲传正知杭州在元丰八年（1085），元祐二年（1087）知郢州。可见《龙龕手鏡》传入北宋后的第一个刻本，是由蒲宗孟在浙西主刻的。其时当在元丰八年（1085）至元祐二年（1087）间。沈括说这个版本“其末归题云重熙二年五月序，蒲公削去之。”这句

话很费解”。“其序末旧题云重熙二年五月序”，当指辽刻《龙龕手鏡》智光序末旧题。重熙已是辽兴宗耶律宗真的第二个年号，二年是北宋仁宗赵祯明道癸酉二年（1033）。“蒲公削去之”，更令人费解。既有如此明确的作序年款，蒲传正为什么要把它削去呢？不可理解。而且合这两句话之义，沈括似是亲见其书，否则说不出如此斩钉截铁的话。可是问题往往出在这种斩钉截铁的武断上，而事实却全然两样。

1982年，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高丽本《龙龕手鏡》，其智光序末的年款为“时统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癸亥序”。高丽与北宋及辽都有往来。且辽与高丽不照辽与北宋那样关系紧张，北宋向高丽赠书赠物，辽向高丽也赠书赠物，似不存在书禁问题，所以《龙龕手鏡》由辽传至高丽，后由高丽再行重刻，是完全可信的。而直接祖于辽刻本的高丽本，其序年为统和而非重熙，当然也完全是可信的。同样本文所评介的宋刻本《龙龕手鑑》，其祖本虽非辽刻，而是早于它的宋刻本，但其序年也是统和而非重熙。可见沈括所记是绝对不可信的。这牵涉到《龙龕手鏡》的成书年代问题。辽代立国在公元916年，早于北宋立国近半个世纪。至统和十五年（997）已有八十余年历史，势气兴旺，文事繁荣，佛事正盛。此时由行均起而编纂《龙龕手鏡》，逻辑上也是很自然的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谓沈存中言《龙龕手鑑》“‘其末旧题云重熙二年序，蒲公削去之。’今本乃云统和，非重熙，岂存中不见旧题，妄记之耶！”这是与沈括生活在同一时代人发出的质问。亦可证沈括所言重熙之误。

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《龙龕手鑑》，明末清初为毛氏汲古阁的架上之物，以其钤有“汲古阁”、“子晋”、“毛氏子晋”、“汲古主人”等印记可证。其时卷三盖已残缺，故由毛氏汲古阁假另一宋本影抄而补配。清嘉庆时又辗转归于汪士钟，以其钤有“闾源真赏”、“汪印士钟”等印记可证。民国间，此书又归浙

江财阀之婿陈澄中。陈澄中藏书很讲究，尤以珍藏宋刻本《荀子》而自喜，故颜其藏书室曰“荀斋”。今《龙龕手鑑》之上仍钤有“祁阳陈澄中藏书记”、“荀斋”等印记可证。陈氏后寓居香港，其藏书中的珍品于新中国建国后分两批价售给北京图书馆，《龙龕手鑑》是其一也。由于自毛晋、汪士鐘、陈澄中以来，都只谓此书是宋刻本，所以北京图书馆在正式编目时，亦笼统著录为宋刻本。

此本系皮纸印造，字体颇类《九成宫》，尚含欧字风韵。刀法娴熟，严整剔透，整体风格，似是浙江地区刻本。此本书口或说是版心，上镌每版大小字数，下镌刊工姓名。今可检阅者，其刻工计有：实、新、张刊、澄习、良、金良、何全、郑林、徐、范、子、范子荣、李生、林茂、林盛、虞、徐永、朱祥、沈绍、朱礼、胡杏、王成、王因、陈乙等。

考徐永，为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工。王成亦南宋初期杭州地区良工，他参与过绍兴九年（1133）临安府主刻《文粹》的雕板工作；在绍兴间为严州刊印过《艺文类聚》等。王因也是南宋初杭州地区良工，也在绍兴九年参与刻过《文粹》。林茂在南宋初参与过《三国志·吴志》的补版工作；参与过鹄山书院本《资治通鉴》的雕印工作。林盛参与过《切韵指掌图》的雕印工作。何全也是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工，在绍兴九年（1139）为临安府雕印过《文粹》。这样一批刻工又同时出现在《龙龕手鑑》上，有力证明此本《龙龕手鑑》大约也是南宋初期浙江地区刻本。结合前述此本之风格特点，亦属浙刻风貌。因定此书为南宋初期浙江刻本，盖不会有很大的出入。此本海内仅知北京图书馆有所收藏。此外北京图书馆还藏一宋刻残册，仅存卷二，亦为十行本。北京图书馆还藏有此书的明代影宋抄本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清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经井斋影宋抄本。上海图书馆藏有清初抄本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清袁氏贞节堂抄本。北京图书馆还藏有

清虚竹斋刻，李慈铭题跋本。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还藏有一个清刻，姚觐元录钱保塘批校本。而高丽本亦已影印行世。此时若能有人汇集众本加以校勘，定会产生一个新的更好的版本。行均若在天有灵，也定会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

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撰 刘宋裴骃集解 南宋初年淮南路转运司刻，宋元明初递修本 每半叶九行，行十六字，小字双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司马迁，字子长，陕西夏阳（今陕西韩城南）人。司马谈之子。大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（公元前145年）或汉武帝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5年），卒年不详。早年游踪遍及大江南北，考察名胜古迹，采集风俗史实，为其后撰写《史记》打下了实证基础。初任郎中，元封三年（公元前108年）继父职，任太史令，获得了阅读史官所藏图书的自由，又为其后撰写《史记》准备了丰富的文献资料。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与唐都、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，对历法进行改革。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，得罪下狱，受宫刑。出狱后任中书令，虽属刑余之人，却“所以隐忍苟活，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。……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，屈原放逐乃赋《离骚》，左丘失明厥有《国语》，孙子膑脚兵法修列……，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…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略考其事，综其终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纪，上计轩辕，下至于兹，为十表、本纪十二、书八章、世家三十、列传七十，凡百三十篇。……草创未就，会遭此祸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，仆诚已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……。”（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）这就道出了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的前因后果。其成书大约在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（公元前104—前91），原名《太史公书》，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。后其书有缺，于西汉元帝、成帝间，由褚少孙补撰《武帝纪》、

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列传》、《日者列传》等篇，又附缀武帝天汉以后史事。后人对《史记》的注释，则以南朝刘宋裴骃的《史记集解》、唐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、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等三家注最为有名。宋代将三家注分别排入正文之下，便于披绎。

最早为《史记》作注的是徐广。徐广是晋朝人，字野民。其家世代好学，至广尤精，百家数术，无不研览。累迁秘书监。尝撰《车服仪注》及《晋纪》，另有《答礼问》百余条。年过七十，犹岁读五经一遍。其所注《史记》，到裴骃作《史记集解》时还经常引用，并作为一家之言。

裴骃，字龙驹，河东闻喜（今山西新绛县西南）人。乃裴松之之子。南朝刘宋时尝官至南中郎参军。其他事迹则史载不详。骃颇有其父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遗风，起而集注《史记》。前已述及，最早铨释《史记》者是徐广，然“骃以徐广《史记音义》粗有发明，殊恨省略，乃采《九经》诸史，并《汉书音义》及众书之目，别撰此书。其所引证，多先儒旧说，张守节《正义》尝备述所引书目次……，知当日援据浩博。……自明代监本以《索隐》、《正义》附入，其后又妄加删削，讹舛遂多。”

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十五）这说明裴骃《史记集解》之作，乃嫌徐广《史记音义》之粗略，因而自己才博采群经、诸史、旁及众书之目，集解《史记》。明代监本《史记》附入《索隐》、《正义》之后，又讹舛颇多，故单行本《史记集解》就显得很珍贵。而宋版单行本《史记集解》，当然就更为珍贵。

本文所要评介的宋本《史记集解》，每半叶九行，行十六字，小字双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原版版心上方未镌每版大小字数，下方镌刊工姓名。版式字体风格明显不同，墨色浓淡也不一致，显系递相补版所致。黄尧圃《百宋一廬賦》，著录有蜀大字本《史记集解》一百三十卷，亦为每半叶九行，每行

大十六字，小二十字。所缺以旧抄本补配。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，亦著录有蜀大字本《史记集解》残帙，所记行款与黄氏《百宋一廬赋》所记相同。北京图书馆还藏有一部与上述诸家所记完全相同的版本，封面有吴云手跋一通。谓：“蜀大字本《史记》，计《本纪》十二卷，十册；《年表》十卷，十册；《八书》八卷，四册；《世家》三十卷，十二册；《列传》七十卷，三十册。通计一百三十卷，六十六册。惜抄配及别本羸入者过半。旧为孙敬亭藏，今归两罍轩。同治己巳新正月初四日读《秦本纪》毕，漫记。”跋下钤“吴云私印”。可见从黄尧圃到张金吾、吴云，都鉴定此本为蜀刻本。黄尧圃、张金吾都是藏书名家，插架宏富，眼界极宽，他们的审定意见，一般不容置疑。吴云字平斋，晚号退楼，又号愉庭。清代归安人。历署苏州知府。为人笃学考古，至老不疲。有《两罍轩彝器图释》、《古铜印存》、《古官印考》、《考印漫存》、《焦山志》等传世。亦是一位敏而好古，精于金石鉴赏的雅士。他对此本《史记集解》更是毫无隐讳地命笔直书其为“蜀大字本”。

但是，这些名家的鉴定意见到底对不对呢？下列事实可证这种审定是有疑问的。

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、历书、李斯列传、樊，酈、滕、灌列传、匈奴列传、滑稽列传等原版末叶，均镌有“左迪功郎充无为军军学教授潘旦校对；右承直郎充淮南路转运司干办公事石蒙正监雕”二行。考无为军，位居长江北岸，汉时为襄安等县所辖之地，本称无为镇。三国时曹操征讨孙权，筑城于此。然攻吴无功，因号无为城。不久又称为无为监，宋代置无为军。又析巢、庐江二县地置无为县，为军治。元代升军为无为路，寻降无为州。明洪武初以州治无为县，省入，属庐州府。清因之，属安徽省。民国改州为县，属安徽省安庆道。可见无军地处安徽。

又有“淮南路转运司干办公事石蒙正监雕”字样，可证此本

之镌梓又与淮南路有关。考淮南路，乃宋至道十五路之一，治所在今江苏扬州。其辖境南至长江，东至海，西至今湖北黄陂、河南光山，北逾淮水。包有今江苏、安徽的淮北地区各一部分和河南的永城、鹿邑等县。北宋神宗熙宁间（1068—1077），又析淮南路为东西两路。淮南东路，简谓淮东路，辖境相当今江苏北部部分地区、安徽全椒、嘉山、蒙城、涡阳以东，北及河南永城、鹿邑等县。治所仍在扬州。淮南西路，简称淮西路，辖境相当今安徽凤阳、和县以西，湖北黄陂、河南光山以东的江北淮南地区。治所在庐州，即今安徽合肥县治。

该书既由无为军军学教授潘旦校对，又由淮南路转运司干办公事石蒙正监雕，那就表明这两人必有一定的地缘关系，否则不可能凑在一起共办一件事。前边说过了，无为军在安徽，尝属庐州府。而淮南西路治所宋时亦在庐州。可证无为军教授潘旦、淮南西路转运司干办公事石蒙正，确实可能同时在一地为官，即在今安徽合肥为官，故一校一雕，完成了《史记集解》的镌印。

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谓：“曰无为军、曰淮南路，均不在蜀境之内。今眉山七史宋刊卷叶犹有存者，其每行字数为十八，与此之十六字，亦有不同。余非敢谓前人为误，特未得其左证，不能无所怀疑耳。”这段话的意思，是针对前人谓此本为蜀刻本而发的，虽未直接否定前人说法，实已提出重大怀疑。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实出张元济之手，大家风范，不轻下结论。实则本书多次出现的校勘、监雕官衔名，已毋庸置疑地说明，此本《史记集解》绝非蜀刻，而必是淮南西路转运司石蒙正刻本。

转运司在宋代专司一路或数路财赋的收运，兼有督察地方官吏的权力。后来职掌更大，兼理边防、治安、钱粮、巡察等事，成了府州以上行政长官，可谓权、钱俱有。而宋代，刻书出版事业极为发达，不但私宅、坊肆竞相刻书，政府机关、州、府、军、县衙署、职能机构、各级学校、各地书院，也竞相刻书。这

是两宋的时代风气。若茶盐司、转运司，则由于公帑宽绰，不但竞相刻书，而且刻得铺陈考究，多属上乘。此本《史记集解》虽属皇皇巨帙，却取九行十六字的款式，亦属铺陈之本。

此本《史记集解》不是蜀中刻本，而是淮南西路转运司刻本，已如上述。但是它到底刻在何时呢？仍需做进一步的考证。

此本刻工颇多，且因三朝递修，还显得颇乱。检现能知道者开列于后。计原板刊工有：戴祐、王华、屈旻、朱明、袁俊、何通、王泽、周永、卢鑑、李彦、李恂、丘甸、仇永、袁俏、罗成、吴佐、王祐、翟荣、杨安、陈彦、韩仔、赵明、魏俊、杨谨、宋寔、顾珫、王璟、彭祥、曹礮、陈德、陈用、顾真、杨垓、施光、魏正、叶青、吴迪、叶石、张宗、章旼、张翼、俞尚、刘章、李秀、叶才、林选、陈伸、陈震、陈权、孙彦、汪靖、张真、王全、吴焕、吴伸、谢兴、王寿、杨明、陈寿、杨道、杨守道、仲良，仲鉴、良华、再兴、闵孝中、戚聪旺、王先文等。其中王华参与刻过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，虽无确切的刻书年代，但该书避讳至“構”字，显系南宋初期刻本。另外于绍兴间还为两浙东路茶盐司刻过《唐书》。还在绍兴间为严州刻过《艺文类聚》，此本避讳亦至“構”字而止。王寿在南宋绍兴间为江南东路转运司刻过《后汉书》。杨谨在南宋绍兴间为杭州刻过《管子》。杨明在绍兴间为严州刻过《世说新语》。李彦在绍兴间为严州刻过《艺文类聚》。李秀在绍兴间为剡川姚氏刻过《战国策》。叶青在南宋孝宗朝参与刻过朱熹辑《河南程氏遗书》。这些刻工同时又出现在《史记集解》上，说明《史记集解》之刻亦当在南宋初年。且这些刻工多是浙江杭州地区刻工，上举参与所刻之书亦是浙江各地的镌板。地处淮南西路的转运司，不惜耗费从浙江雇佣良工，开雕《史记集解》，不能不说是文化上的义举。这样，我们从刻工的刻书实践活动中，已大体可以判断此本《史记集解》的版刻时代，当是南宋初期。

此本避讳，由于递修的关系，看上去也比较混乱。如玄、弦、絃、眩、炫、縣、悬、敬、警、驚、竟、境、弘、泓、慤、慤、匡、恒、祯、贞、徵、廕、讓、署、豎、树、戌、頊、姁、桓、垣、洹、完、浣、獮、丸、構、媾、購、覲、構、穀、慎等字均缺末笔，以示避讳，且都见于原刊诸叶，这说明此本之刻已届孝宗朝了。然于补刊之叶上，却又有玄、眩、弘、殷、敬、匡、筐、恒、徵、树、戌、頊、桓、構、媾、覲等字缺末笔，反至高宗赵构而止，实不可思议。其书卷二十六“購问莫之谁子，于是韩购县之”中的“購”字缺笔避讳。可同卷“今闻購将军”句中的“購”字却又不缺笔。卷三十一“布曰事以構”中的“構”字亦不缺笔。卷四十“高祖購求布”、“周氏曰汉購将军”中的“購”字却又缺笔，极为混乱。卷四十二“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，慎夫人新丰道之，此走邯郸道也。张晏曰慎夫人邯郸人。使慎夫鼓瑟。”句中的“慎”字均不缺笔。卷四十六“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，慎无反”句中的“慎”字却又缺笔，也是混乱。这表明淮南路转运司虽也是官署，但其刻书避讳却不象国子监等中央直属机关那样严格，不但带有随意性，校正也不甚严肃，所以出现该回避的字也时避时不避。但不管怎么混乱，同一个字只要出现缺笔现象，不管其他地方避不避，都能说明其板刻期限已届所讳之帝了。如上述尽管多数“慎”字不缺笔，只有一处“慎”字缺末笔，那也证明其开板已是南宋孝宗时代了。所以此本之刻当是南宋孝宗之时，并不如北京图书馆原先所著录的是什么高宗绍兴间刻本。可见此本的著录，应是南宋初期淮南西路转运司刻本。

至于递修刻工，人数亦夥，时代跨度也大，表明此本《史记集解》确经宋元明三朝递修。所以此书版本全称著录应是“南宋初期淮南西路转运司刻宋元明初递修本”。

此本钤有：“南京礼部公书之印”、“王世懋印”、“王敬美父”、“敬美甫”、“郎邪王敬美氏收藏图书”、“损斋居

士”、“古奉常氏”、“毛凤苞印”、“子晋氏”、“毛晋私玺”、“汉古阁世宝”、“毛表之印”、“毛表私印”、“毛表”、“毛表印信”、“毛表藏书”、“毛表鉴定”、“臣表”、“隐湖毛表图书”、“毛表奏叔”、“毛氏奏叔”、“奏叔氏”、“奏叔”、“毛奏叔收藏记”、“毛氏藏书子孙永保”、“毛姓秘玩”、“审定真迹”、“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”、“错”、“集贤里人”、“华笑庸藏”等印记。

明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，南京旧有的机关建置和政府体制基本保留未动。“南京礼部公书之印”，表示的即是永乐迁都后，此书曾是南京礼部的官书，可见此本在明嘉靖以前曾是南京政府公藏。王世懋，字敬美，别号墙东生，更署损斋，学者称其为麟洲先生。王世贞的胞弟。嘉靖三十八年进士，尝为南京太常少卿。其兄王世贞，字元美，是当时文坛领袖，名噪一时，且尝为南京刑部尚书。藏书凡三万卷，自谓“余平生所购《周易》、《礼经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唐书》之类，过三千余卷，皆宋本精绝。最后班，范二书，尤为诸本之冠。”（见《天禄琳琅书目·汉书跋》）此本《史记集解》之上钤有多枚王世懋的印记，岂即其兄所谓宋本精绝的《史记》欤？总之是他们弟兄俩都曾在南京做官，此本《史记集解》他们都有得到的机会，故尔成了王氏兄弟的架上之物。又钤有多颗毛晋和毛表的印记，表明此本到明末又成了毛氏汲古阁的架上珍品。民国年间收归上海潘氏宝礼堂，最后入藏于北京图书馆。毛氏曾希望此书子孙永保，并祈求“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”。今此书完好无损，专库庋藏，时时刻刻有专人保管，此毛表始料恐未及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